

魏方, 余孟韩, 李怡啸, 王向荣. 基于战术都市主义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研究: 一种促进景观公平的实践路径 [J]. 风景园林, 2020, 27 (9) : 102-108.

基于战术都市主义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研究 ——一种促进景观公平的实践路径

Research on Community Public Space Renewal Based on Tactical Urbanism — A Practical Path to Promote Landscape Justice

魏方 余孟韩 李怡啸 王向荣 *

WEI Fang, YU Menghan, LI Yixiao, WANG Xiangrong*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20)09-0102-07

DOI: 10.14085/j.fjyl.2020.09.0102.07

收稿日期: 2019-12-28

修回日期: 2020-07-02

魏方 / 女 /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WEI Fang, Ph.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余孟韩 / 女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在读本科生

YU Menghan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李怡啸 / 女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在读本科生

LI Yixiao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王向荣 / 男 /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院长 / 本刊编委会副主任 / 研究方向为国土景观、现代景观设计理论

通信作者邮箱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xr@dyl.cn

WANG Xiangrong, Dr.-Ing., is a professor and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erritorial landscape and theory of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摘要: 当代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存量更新问题日渐凸显, 传统的社区更新模式难以协调人与空间、弱势阶层与强势阶层之间的矛盾, 社会公平难以实现。以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战术都市主义为研究对象, 从空间格局、参与主体、时效持续性 3 方面探讨了战术都市主义在社区公共空间更新进程中对景观公平的推动作用。进一步通过识别更新对象空间、完善更新主体构成、试验更新方法与实施路径、更新绩效评估与反馈, 总结出战术都市主义促进景观公平的社区公共空间实践路径, 并提出了基于中国具体国情的应用展望。

关键词: 战术都市主义; 社区空间更新; 景观公平; 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 5190803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 (编号 19YTC04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编号 2019M6500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编号 BLX201810); 北京林业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编号 2019XKJS0317);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 (编号 G201910022014)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made urban stock renewal more problematic. The conventional model of community renewal can hardly mitig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n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ivileged class and the underprivileged of the society, which hinders social equity. To illustrate the positive roles of tactical urbanism towards landscape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renewal,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actical urbanism that has recently flourished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aspects of spatial pattern, particip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Based on identifying the renewal spatial object, improv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enewal subjects, experimenting renewal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mplementing the renew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e practical paths of tactical urbanism for community public space renewal that promotes landscape justice and forecasts the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 of China.

Keywords: Tactical Urbanism; community space renewal; landscape justice; practical path

Fund Items: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o. 51908035); Beijing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No. 19YTC040);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General Program (No. 2019M650016); Special Funds of Central Colleges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Business Expenses (No. BLX201810); The World-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Guidance Funds for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o. 2019XKJS0317);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Plan (No. G201910022014)

1 战术都市主义的提出及发展

战术都市主义 (tactical urbanism) 作为一种新的更新实践思潮, 其核心思想可追溯至列斐伏尔的“城市的权利” (The Right to the City) 理

论。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工业国家由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 普遍面临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空间商品化、社会阶级矛盾爆发等问题。列斐伏尔指出这些矛盾背后隐含着公平问题, 保

障公民行使城市权利是有效回应社会各阶层对城市空间公平分配诉求、实现城市空间公平的途径^[1]。近年来北美城市所呈现出的经济萧条、城市人口激增、互联网崛起以及政府与市民交流不畅四大问题,为战术都市主义的产生做了铺垫,使之成为将市民的权利和责任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一场运动。

战术都市主义可以更好地回应城市过度扩张的遗留问题。设施与资源更新问题促使人们开始考虑采取更小尺度的、渐进式的投入,以及更有效地处理闲置空间的方式。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得战术都市主义的传播更加便捷,提供了筹款的渠道,便于组织公众积极参与到更新实践中。战术都市主义最初是市民自发组织进行的公共空间更新实践,如“游击都市主义”(guerilla urbanism)、“快闪都市主义”(pop-up urbanism)、“城市修复”(city repair)、“自主都市主义”(D.I.Y. urbanism),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城市规划师整理汇总并被统称为“战术都市主义”。

2011年“战术都市主义”首次出现在文章“Tactical Urbanism: Short-Term Action for Long-Term Change”中,其后麦克·莱登(Mike Lydon)和安东尼·加西亚(Anthony Garcia)等城市规划师每年出版一册《战术都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介绍各地实践,这一系列出版物随后成为重要的战术都市主义实践指导手册。他们将战术都市主义定义为“一种城市中有组织的,有市民参与的短期、低成本、多尺度进行干预并达到长期改善结果的改造途径”^[2]。如今常用战术都市主义形容用于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的小尺度、短期方案,这些方案用小而简的介入手段带来空间物理属性以及社会属性上的显著变化^[3]。

区别于增量规划侧重“量”而忽视“效”,战术都市主义更关注城市存量空间,挖掘公共空间二次开发的潜力,关注如何弹性地适应城市需求;战术都市主义实践中社会各阶层上下协商、共同规划,以盘活、优化、挖潜等方式更新公共空间使其更贴近民生福利需求;不同于一次性建成目标,战术都市主义还关注不同介入方法的试验成果与长期效益。基于此,笔者对Tactical Urbanism出版物中位

于美国、英国、澳洲及南美洲的共88类建成项目^[4]进行研究,分析讨论战术都市主义如何推动景观公平进行。

2 战术都市主义介入社区空间更新的特征——促进景观公平

景观公平是指对环境利益及环境负担的公平分配,包括公共环境资源的分配公平以及不同阶层对环境制度的决策公平。景观公平将生态环境和民主平等议题与景观设计相结合,以景观介入的手法改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构建出具有良好社会适应性的社区空间。战术都市主义实践则从空间、主体、时效3个方面推动社区公共空间更新,从而促进景观公平的实现:更新的过程中将市民阶层纳入更新主体,保证了不同主体平等地享有使用和更新社区公共空间的权利;将剩余空间作为更新对象,促进消极空间有效转化,实现空间格局公平分配;以低成本、可持续的景观介入方式进行试验,提升更新绩效的可持续性。

2.1 主体多元性——促进参与公平

城市空间被当作生产和被生产的对象^[4],导致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形态样板化,城市文化磨灭^[5]。城市空间资源的支配权集中于少数的社会精英阶层中,造成了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丧失和场所精神的遗弃^[6]。市民阶层只拥有政府规划的样板化空间资源,这类空间难以适应需求并及时更新。战术都市主义为市民阶层提供了“反叛”样板化、精英化城市设计的途径, Lydon将战术都市主义称作“市民用以绕开滞后的政府规划、充分发掘优化社区的无数种可能的工具”^[6],将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方式转变成“上下协商”以及“自下而上”的形式。

在2015年伦敦的“游击花园”(Guerilla Gardening)活动中,“游击园艺家”Richard Reynolds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组织社区居民对缺乏市政管理的街边绿地进行改造,首先展开绿地“领养”活动,鼓励居民公平地参与改造和使用这些空间,之后通过英国合作银行的筹款项目获取资金支持。他们将该活动称为“因政府忽视社区中绿地系

统建设而向其发起的战争”。

这一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与中国制定的保障市民阶层实质性参与环境事务权利的策略相契合。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于环境的需求,建立健全制度鼓励民众表达环境诉求,以实现“上下协商”的良性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模式^[7],促进社会各阶层参与到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的过程中,精准回应空间的使用需求。北京景山片区公共空间景观更新项目就尝试将“上下协商”的方式运用到胡同空间更新的进程中,通过公众调查、采访及论坛等方式让居民参与决策制定,从而保证居民对于环境的话语权及支配权^[8]。

2.2 空间灵活性——促进空间格局公平

传统规划模式易造成资源的空间倾斜。尤其在西方,优质空间往往集中于高收入群体聚居区。因此,对欠缺经济效益而长期缺乏管控的废弃空间进行改造,可以促进公共空间资源在地理位置层面的公平分布。从空间类型和尺度来看,传统城乡规划聚焦大型公共建设、生态廊道等大尺度的空间营造,战术都市主义在小尺度社区空间建设方面更具优越性。战术都市主义将更新对象框定在街区、街道、邻里、建筑环境等较小尺度内,因为在这些场所内社会资本和创造力最易被激发。Lydon和Garcia认为战术都市主义最为恰当的应用地点是未被完全开发利用且步行可达的城市空间^[9],比如路边的停车场、桥下空间等,植入活动、设施可使其重获活力。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主张将低效使用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其他功能的公共空间。Robert Steuteville认为大面积停车空间所能容纳的社会性活动有限,在没有车辆停放的情况下也因为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性而难以提供其他功能^[10]。在意大利圣多纳托城的“给予城市儿童自由”(Liberation Front of the Urban Youth)项目中,设计师、学校、市民与志愿者合作,将长期被用作停车场的小型空地改造成适合儿童活动的户外空间,对周边学校、社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图1)。

中国城市快速建设的进展中,公园绿地因客观历史原因多呈集中态势,同时区域性人口增长差异以及市民收入差异也导致空间



1 圣多纳托城郊停车场改造^{[11]58-61}
Parking lot transformation in the suburb of San Donato^{[11]58-61}

格局分配不均，目前国内也有针对区域空间整体性下降、空间格局与城市形态脱节的低效使用空间的相关研究^[12]。北京大栅栏胡同微更新计划以公共环境质量较差的胡同为研究对象，通过立体绿化覆盖、微型花园营建等方式将茶儿胡同12号院改造为胡同绿色微更新示范基地，并以此试验点为中心带动区域公共空间体系的发展^[13]。

2.3 时效延续性——促进绩效可持续

Lydon 和 Garcia 强调战术都市主义的特点之一是“促成长期改变的阶段性手段”。战术都市主义实践首先在短期内采取试验性的干预措施，在证实其可行性之后转化为持续有效的永久性改变，进而为政府的规划提供参考，后续更新实践便以更为高效而准确的方式进行^[2]。战术都市主义的一些实践案例已经证实，在大尺度城市建设之前进行渐进式的景观介入，具有更高的容错率，利于提升建成景观绩效的可持续性。PARK(ing) Day 项目在6年内于162个城市中发展出了975个案例（图2），其中旧金山的PARK(ing) Day项目每块场地最多有12个月的试验期，确定符合需求后可规划为长期项目，使用的可持续材料可以用普通建材1/3的价格实现2~10年的使用时效，在项目开展的7年中已经发展出了超过35个受市政批准的可向永久状态过渡的街边公园；发源于波特兰的“路面转化绿地”（Depave）项目在5年内软化了8 742 m²的土地，发展了700名志愿者，处理了8 407 kL的雨水，成为雨洪管理区域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城市热岛效应缓解、空气净化、噪

声消解及动物自然生境营建等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

从景观公平的角度来说，所有实践行为都需要考虑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以及当代与后代的需求调和。因此需要确保实践效果的可持续性，从而在时间维度上实现景观绩效公平分配。

从经济绩效来说，美国波特兰的“食物售卖车”（Food Cart）项目将低成本的食物售卖车引入社区中利用率较低的公共空间中。通过提供价格低廉的食物吸引人流，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在激活该区域的功能潜力后，将食物售卖车与公共空间改造结合，使其收益进一步扩大并实现绩效可持续。在环境绩效方面，美国迈阿密的“野草爆炸”（Weed Bombing）活动中，社区绿地中的野草被喷刷上鲜艳的色彩，在短期内起到了即刻美化社区环境的作用，进而引起当地市政对于公共绿地管理的重视，推动社区更新的进程。同时，战术都市主义从提升社区环境指数、增进邻里关系等方面实现了社会绩效的可持续：流行于美国纽约的“城市游戏”（Urban Game）项目强调公共空间的社会性，在城市中以改造、增设的方式发展公共娱乐空间，向大众提供可以社交游戏的空间来激发社区活力，从而产生积极的社区关系。

中国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区域人口不均等增长、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等问题，城市生态有待发展，传统的封闭式小区也不利于建设共享式城市公共空间。战术都市主义以低成本、易实施的实践思路促进中国城

市社区空间经济、环境及社会绩效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市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的改造，在保留市场风貌的基础上通过摊位美化、文化营建等低成本方式实现了菜市场的长期、良性发展，进而带动了社区的活力风貌建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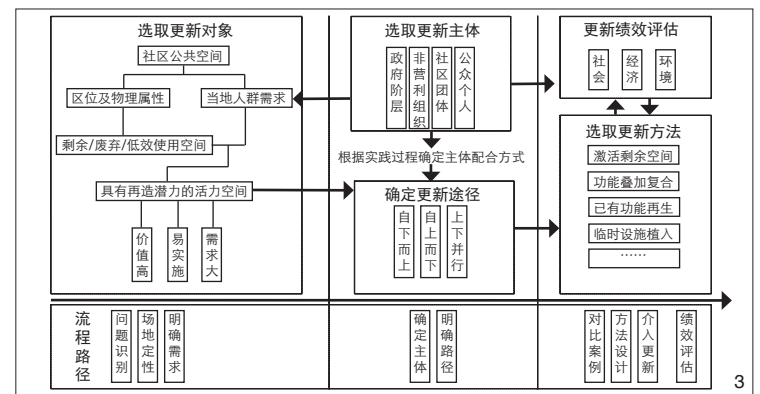
3 战术都市主义促进景观公平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实践路径

目前，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的大背景下，战术都市主义是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的趋势，其主体公平、更新对象公平、绩效可持续的特征反映了人们对实现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公平的意愿。在分析已有实践案例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基于战术都市主义理论的促进景观公平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实践路径（图3）。

3.1 更新空间对象识别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重点改造城市更新过程中未被完全开发利用的剩余空间，前期以提升区域价值、满足人群需求、低投入高绩效为标准识别更新对象。通过不同的设计策略，激活城市“间隙”与废弃空地，补充完善城市生态的连接、景观要素的组织、公共设施的建设，发挥社区公共空间的利用潜能^[9]。

为了实现景观公平中的分配公平、参与公平和认知公平^[16]，应将城市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按使用需求的不同对空间资源进行有目的的识别。空间的分配公平体现在优质公共空间有良好的可达性。在当代城市空间更新背景下，空间性质的资本化导致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城郊弱势群体所处区域内的公共空间质量较差，如韩国首尔的九龙



2 PARK(ing) Day 项目（包含 Parklet 和 Pavement to Park 实践）在全球的实践范围扩展^[14]
Expanding global practice scale of the PARK(ing) Day project (including Parklet, Pavement to Park)^[14]
3 促进景观公平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实践路径
Practical paths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renewal to improve landscape justice

村，其基础设施有限，仅能维持低水准的基本生活。战术都市主义实践在此类空间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城市既有空间资源难以再分配的情况下对建成区内具有更新潜力的空间进行挖掘重塑，间接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分配公平。

为实现空间格局公平，更新区域应重点考虑潜在价值高的城市剩余空间。由于此时更新主体是掌握资源较少且能力有限的市民阶层，为确保更新的可行性和易实施性，应优先选择较小尺度的公共空间，如社区邻里空间、高架桥下非正式空间、较小尺度的代征用地等。具体应以空间的地理位置、功能属性等客观条件及空间周围居民的使用需求、更新意愿等主观条件为度量标准。从人群需求的角度来讲，战术都市主义在识别更新对象时应优先选择使用需求矛盾最大的空间，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空间更新效率，从而促进空间资源分配公平。

3.2 更新主体构成

社区公共空间更新主体构成是参与公平中的重要因素。Schlosberg 指出城市环境中不公平并不仅仅是对文化脉络以及生活方式的忽视导致的，其更主要的因素是居民在其所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进程中没有话语权，以及决策阶层内部也会出现决策不公平现象，统计显示美国环境保护局内的工作人员只有 1/4 属于女性及有色人种群体^[17]。单一的更新

主体结构导致了传统的规划模式难以顾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战术都市主义实践将主体的范围从政府阶层扩大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体，是使所有人亲自参与身边空间更新活动的“启动流程和工具”^[18]。战术都市主义通过增加城市空间更新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度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在城市更新中的利益。

战术都市主义更新过程中有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开发商、公众和市民阶层三大类更新主体。具体的主导者包括市长、政府机构以及相关部门、非营利公益组织、企业家、开发商、艺术家、当地活动家、市民 / 社区团体以及个人。根据更新主体的不同，战术都市主义产生的路径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2 类，同时还有不同阶层协商合作产生的“上下并行”的第 3 种路径（表 1）。事实上，多样化的实践主体可以有效促进实践项目可持续发展。目前比较成功的更新路径是个人与社区团体在关注公共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试验式改造，继而得到非营利组织的帮助或是政府的官方支持，并在大范围内推广成功的景观更新方式，最终实现景观更新绩效可持续。

3.3 更新方法选取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根据不同城市空间的开发状态、功能性质以及发展潜力对其采取不同的更新方式，针对空间潜能未开发、空间功能单一、空间功能滞后、空间临时需求

4 种情况，对空间形态、功能等级进行不同强度的介入，从而实现景观公平。其中，景观介入是战术都市主义实践的重要方式，基于短期战术性改造与长期策略安排，使灵活、参与性强、具创新性的更新途径在更广范围得到应用^[18]。从功能来说，景观介入更新途径包括创意绿化种植、移动绿化装置、展览与市场空间、园艺与城市农业空间、视觉触媒、艺术性社区公共设施与艺术喷绘等，通过以上途径激发事件性场所、功能混合的公共空间与公园营造^[19]。笔者根据不同的更新方法将实践内容分为激活剩余空间、功能叠加复合、已有功能再生、功能临时植入 4 类。

3.3.1 激活剩余空间

此类更新方式旨在通过二次开发使城市中被疏漏、遗弃的空间重获社会性及功能性，结合现有环境赋予其可以在短期内快速产生效益的功能形态。美国纽约的“快闪集会厅”（Pop-up Town Hall）项目将一片废弃空地改造为有停留、聚会等基本功能的公共空间，实现了空间激活（图 4）。项目选取当地经济住房倒塌后被废弃的基地，通过置入基本的公共设施、引入节事性活动，提升了该社区的公共活动质量；同时该项目以“上下并行”的方式让不同主体获得了公平参与改造的机会，当地政府批准了宝马古根海姆工作室（BMW Guggenheim Lab）对该地块进行改造利用，之后工作室通过与专家、当地社区居民沟通合

表 1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案例的更新主体
 Tab. 1 The participants of tactical urbanism renewal practical cases

项目	地区	政府阶层			市民阶层				
		城市行政部门	市长办公室	商业发展处	非营利组织	企业家	开发商	本地活动家	社区团体
共建社区	美国							✓	
停车位转化公园	世界范围				✓				✓
游戏街道	美国, 英国	✓						✓	✓
人行道转换广场	美国	✓	✓	✓					
游击花园	美国							✓	
街道集市	美国	✓			✓	✓			✓
快闪零售店	美国, 澳大利亚					✓	✓		✓
路面转绿地	美国	✓			✓			✓	
非正式自行车位	美国					✓		✓	✓
十字路口修复	美国							✓	✓
门前绿地重塑	美国							✓	
移动公园	美国	✓		✓		✓			✓
野草爆炸	美国							✓	✓
城市农业网络	智利				✓				✓

作将该空地改造为工作室的临时所在地，同时提供面向公众的讲座、集会等公共活动。快闪式的公共空间也逐渐被引入各个地区，在英国利兹、加拿大温哥华都出现了相似的案例。

3.3.2 功能叠加复合

有活力的公共空间功能是复合的，针对城市内部高密度的建设，空间与时间复合型功能可以有效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针对街道、停车场等城市功能单一、利用率低、欠缺社会性的空间进行改造，通过分时利用、性质更新、功能植入等方式使其具有对接不同使用需求的弹性。美国纽约的“游戏街道”（Play Street）项目和 PARK(ing) Day 项目针对城市道路过宽导致的利用率低下与社区活动空间不足问题，在不影响城市交通的前提下将低收入社区内车流量较小的道路与停车空间转化为社区活动空间，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社交功能容量，实现了功能复合。

3.3.3 已有功能再生

部分城市存量空间的初始规划功能形态

基本符合使用需求，但是欠缺的管理措施以及滞后的政府规划更新导致其难以跟上周边环境以及使用需求的更替，针对此类空间更新需要进一步提升策略的适应性。美国波特兰的“路面转化绿地”项目由社区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策划、实施，居民对社区中使用率较低的硬质路面进行拆除、回收，并在“软化”后的地面上添加生境恢复、城市农业、城市绿化、社区集会等功能，将道路空间改造为社区公共绿地，实现了社区空间再利用（图 5）。同时，利用已被“软化”且有种植的空间收集雨水，对环境效益起到积极作用，成为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和可持续排水系统（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 SuDS）的重要组成部分。

3.3.4 功能临时植入

在城市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新需求很难通过扩张空间的方式来处理，植入临时功能可以快速响应活动需求，对未来的更新方向进行试验。针对城市中心空间难以继续扩张而公共绿地不足的问题，美国旧金山“移动

公园”（Park Mobile）项目由政府联合本地商业和社区团体将铁箱改造为兼具绿化和休憩功能的迷你公园放置于街道旁，快速回应了周边市民对公共绿地的迫切需求，打破了空间供给和空间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让市民阶层获得了参与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的机会，实现了参与公平（图 6）。

3.4 更新实施过程

根据更新主体的不同，战术都市主义引导下的空间更新实施过程可分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并行”3 种类型。其本质差异在于市民阶层和政府阶层参与的程度各有偏重，但都强调了让公众切身参与到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的实施过程中，打破传统模式中政府包办的状态。

第 1 种实施过程是市民将战术都市主义作为调整政府不合理规划方案的工具，即在未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下，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进行改造活动，最终争取到政府的支持。例如在 SWA 公司和街道联合会（Street Collaborative）于美国达拉斯合作策划的“共建社区”（Build a Better Block）项目中，项目组织者和居民在街道旁增设慢行道、街边咖啡座及街边绿化等，并邀请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前来感受改造更新后的成果，使政府意识到空间更新对社区所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推动了当地政府更新相关法规，并批准了此类改造项目。

第 2 种实施过程是在已获得政府批准的长期规划蓝图下开展先行试验项目，属于“自上而下”的类型。在“人行道转换广场”（Pavement to Plaza）项目中，纽约交通署主导了帕特南三角广场（Putnam Triangle Plaza）改造项目，政府将机动车道临时封闭，委托设计事务所和社区工作室将其改造为社区开放空间，举行电影之夜、音乐会等公共活动并收集附近居民的反馈意见。广场建成后该区域的交通伤亡事件减少了 76%，交通安全显著提升。政府部门根据反馈进行改进及后续建设，最终在 2017 年实现了机动车道向社区开放广场的永久性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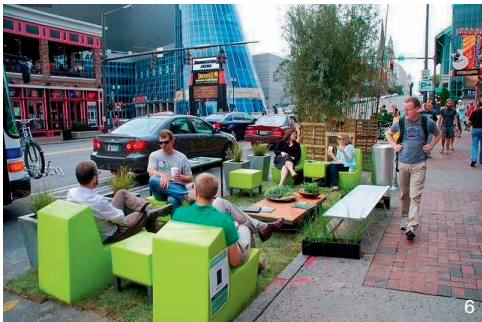
第 3 种实施过程是政府作为主导者，通过与市民沟通，以“上下并行”的方式让公



4 快闪公园项目实践^[20]
Practical cases of Pop-up Park^[20]



5 路面转化绿地项目实践^[21]
Practical cases of Depave^[21]



6 移动公园项目实践^[22]
Practical cases of Park Mobile^[22]

众更多地参与到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纽约“快闪咖啡厅”项目中，市政府鼓励临街的餐厅在其店铺外设置“快闪咖啡厅”，优化户外公共环境。“路面转化绿地”项目的实施获得了社区志愿者和 NGO 组织的协助，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资金帮助。如加拿大绿色社区（Green Communities Canada）组织为建设效益较好的区域提供资金募集，并承担与政府沟通的工作。

3.5 更新绩效评估

传统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主要通过实施总体规划关键策略完成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其建设进程缓慢并具有一定局限性^[23]。战术都市主义更新的实践成果是渐进式的、多维度的、具有试验性的，需对其建成项目进行可持续特征的度量。评估建成后短期绩效，有利于及时调整与改进，还可为同时期其他项目提供参考意见；而长期绩效的评估可以验证项目是否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是否可以促进景观公平。

笔者参考国内已有的公园绿地绩效评估系统对战术都市主义案例绩效进行初步整理（表 2），以其可持续性 & 促进景观公平作为重要维度，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 3 个方面衡量战术式更新实践的总体水平^[24-25]。

4 应用展望

战术都市主义作为一种整合性的理论体系虽然正式提出时间尚短，但其实际操作包含了目前欧美流行的小尺度、渐进式、公众参与的弹性设计，这一理论整合对景观公平

表 2 针对战术都市主义实践的绩效评估体系
Tab. 2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tactical urbanism practices

绩效框架	评估方法	评估指标
经济绩效	特征价格法等	城市化水平、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GDP、经济密度、土地利用结构熵、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
社会绩效	实地观测与抽样调查法等	人均道路面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人均可支配收入、社区认同等
环境绩效	层冠法、植株法、土壤分析法等	建城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碳排放与雨水处理指标等

的推动具有启发意义。

1) 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说，由于土地权属与规划政策存在巨大差异，这一战术性的实践框架从前期的场地调研、背景分析、整体规划，到后期的改造设计、项目实施，都需要针对具体语境选择改造方法和实施路径，以减少不合理改造以及资源浪费。战术都市主义可针对目前留白增绿、见缝插绿等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目标，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利用较小尺度地块栽植乔、灌、花、草，提升社区公共空间绿化质量。战术都市主义通过低成本、易操作、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滞后的问题，为社

区公共空间更新实践提供了借鉴。因此，可以尝试借鉴“共建社区”“快闪公园”（Pop-up Park）等小尺度项目的改造方式，在国内结合社区力量推进社区公共空间的更新，促进优质空间资源的分配公平。

2) 在新的应用语境中，针对不同待改造空间的区位特征，需要市民、NGO、开发商、社区组织及规划部门的协同作用，力图平等公正地进行更新实践，保证社区公共空间更新决策进程中的参与公平。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鼓励自发改造活动，借助社区团体与公益组织推广，建立政府和民众的沟通桥梁，保证社会各阶层可以平等地享有优质健康的空间资源且公平地拥有改造生活环境的机会。

表 3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的国内适用措施
 Tab. 3 Domestic practicable methods of tactical urbanism practices

类别	项目名称	政策	资金	国内适用措施	国内适用范围
未充分利用空间 (underutilized streets)	共建社区	前期社区组织领导，当地商业、居民参与，后期政府批准、协助	民众自筹	由政府完善相应规定，第三方人员提供专业指导，结合街道居委会组织开展活动	街道社区附属绿地
	开放街道	政府领导，非营利组织协助，商业、居民参与	政府资助	政府招募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	调整范围至人行交通如步行街，进行分时策划
间隙、剩余空间 (vacant space)	路面转绿地	政府批准，由非营利志愿组织领导实施	非营利组织筹款	政府招募专业设计师团队与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社区居民参与	经由设计评估的社区剩余空间
	移动公园	非营利组织、社区团体领导	非营利组织筹款	政府招募专业设计师团队与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社区居民参与	经由设计评估的社区剩余空间
游击式介入 (guerilla intervention)	野草爆炸、座椅爆炸	居民自发进行	民众自筹	街镇居委会发动公众参与实验性改造活动，经评估转化为永久改变	经由设计评估的社区剩余空间
企业发展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移动商贩	经营者自发进行，政府制定相关规定	民众自筹，政府补助	经营者结合开放空间改造创业进行申报，政府与社区进行审核管理	低效使用的社区开放空间
社会变化 (social change)	快闪市政厅	NGO、社区团体领导，政府批准、协助	非营利组织筹款，政府补助	政府招募设计师与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	低效使用的社区开放空间

3) 为了保证这一实践理念在更新进程中具有经济、社会、环境 3 方面的可持续性，需要在建设过程中进行预评估，并对其建成效果进行阶段性绩效评估。同时，为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规划弹性适应能力，许多更新项目可以成为政府上位规划背景下的试验性项目，结合后期绩效评估，为大尺度城市规划的优化提供参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增量规划与存量规划并行的阶段，将战术都市主义的实践思路 and 措施适时适地、分区分时地转译运用到国内的社区空间更新中，结合逐渐发展起来的独立第三方人员的选聘制度（如北京推行的责任规划师和高校合伙人团队工作），充分联系民众，有效缓解目前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矛盾（表 3）。正如规划师 John Dempsey 所说，战术都市主义是“一场没有领导者（no one）的全球化运动，它可以让任何一个人（anyone）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最终会造福于每一个人（everyone）的生活”。

注释 (Notes):

① 现在较为成功并且不断辐射发展的具体项目包括：针对低效废弃用地的 Site Pre-Vitalization、Open Streets、Play Streets、Better Block、Pavement to Plazas、Intersection

Repair，针对闲置用地的 Guerilla Gardening、PARK(ing) Day、Pop-Up Retail、Pop-Up Parks、Depave、Park-Making、Parkmobiles，针对可进行功能转化的大众发起的 Guerilla Intervention、Chair Bombing、Informal Bike Parking、Ad-Busting、Reclaimed Setbacks、Weed Bombing，具有企业支持的 Food Carts/Trucks、Mobile Vendors、Micro-Mixing，以及激发社会性活动的 Pop-Up Town Hall、Camps 等项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MITCHELL D.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M]. New York: The Guilfor Press, 2003.

[2] LYDON M, GARCIA A. Tactical Urbanism: Short-Term Action for Long-Term Changes: Vol.1[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2.

[3] Ahbe Lab. From Prototype to Permanent: Tactical Urbanism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EB/OL]. (2017-11-16)[2020-06-04]. <https://ahbelab.com/2017/11/16/from-prototype-to-permanent-tactical-urbanism-in-landscape-architecture/>.

[4] 龙钰. 列斐伏尔城市空间思想探析 [J]. 世界哲学, 2018 (6) : 24-30.

[5] 李晓东, 张烨. 城市“遗余空间” [J]. 世界建筑, 2009 (1): 114-116.

[6] LYDON M, GARCIA A. Tactical Urbanism: Short-term Action for Long-Term Changes: Vol. 4[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4.

[7] 朱力, 龙永红. 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9 (1): 48-54+159.

[8] 郭巍, 侯晓蕾. 胡同里的新生活: 北京旧城景山片区公共空间景观更新 [J]. 风景园林, 2018, 25 (4) : 62-67.

[9] LYDON M, GARCIA A. Tactical Urbanism: Short-Term Action for Long-Term Changes: Vol. 2[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2.

[10] STEUTEVILLE R. Why Street Grids Have More Capacity[EB/OL]. (2018-07-31)[2020-06-04]. <https://www.cnu.org/publicsquare/2018/07/31/why-street-grids-have-more-capacity>.

[11] LYDON M, GARCIA A. Tactical Urbanism: Short-Term Action for Long-Term Changes: Vol. 5[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7.

[12] 徐宁. 效率与公平视野下的城市公共空间格局研究: 以瑞士苏黎世市为例 [J]. 建筑学报, 2018 (6) : 16-22.

[13] 张文海. “绿色空间微更新”: 探讨大栅栏社区微更新行动: 以茶儿胡同 12 号院为例 [C]//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9 年会论文集 (上册). 北京: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9: 372-376.

[14] PARK(ing)Day[EB/OL]. (2014-08-23)[2020-06-04]. <https://streetswithoutcars.wordpress.com/2014/08/23/parking-day/>.

[15] 侯晓蕾, 刘静怡, 赵幸, 等. 老菜市场的新生: 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环境营造及业态升级改造实践 [J]. 城市建筑, 2018 (25) : 55-58.

[16] SCHLOSBERG D. Reconcei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Glob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Theories[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4, 13: 3, 517-540.

[17] KUHN S. Expa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J]. Ecology Law Quarterly, 1999, 25(4): 647-658.

[18] LYDON M, GARCIA A. Tactical Urbanism: Short-Term Action for Long-Term Changes: Vol. 3[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3.

[19] DE SMET A, VAN REUSEL H. How One Tree Can Change the Future of a Neighbourhood: The Process Behind the Creation of the Boerenhof Park as an Example for Tactical Urban Planning[J]. Urban Forestry and Urban Greening, 2018, 30: 286-294.

[20] Pop-Up Parks Lead to More Biodiversity in Cities, Study Finds[EB/OL]. (2019-07-09)[2020-06-04]. <https://www.ucpcouncil.com/pop-up-parks-lead-to-more-biodiversity-in-cities-study-finds/>.

[21] Guide to Depaving Cities[EB/OL]. (2011-03-31)[2020-06-04]. <https://www.filmsforaction.org/takeaction/guide-to-depaving-cities/>.

[22] PARK(ing) Day[EB/OL]. (2016-09-28)[2020-06-04]. <https://www.civicsdesigncenter.org/events/parking-day>.

[23] 张翰卿, 陈莉莉.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 (5) : 35-41.

[24] 周聪惠. 公园绿地绩效的概念内涵及评测方法体系研究 [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 (2) : 73-79.

[25] 刁星, 程文. 城市空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践 [J]. 规划师, 2015, 31 (8) : 110-115.

图表来源 (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 1 引自参考文献 [11]; 图 2 引自参考文献 [14]; 图 3 由作者绘制; 图 4 引自参考文献 [20]; 图 5 引自参考文献 [21]; 图 6 引自参考文献 [22]; 表 1 由作者根据 Tactical Urbanism 项目案例整理绘制; 表 2、3 由作者绘制。

(编辑 / 王一兰)